

层裂化、碎片化、边缘化： 百年四库学景观论略

张晓芝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百余年来,四库学研究成果斐然,然而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通过对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四库学繁荣的背后存在诸多问题。四库学概念含混,且这一概念并不存在术语化过程,无限制的外延造成四库学研究偏离文献与思想这一正统的“二元”学术体系。四库学学术指向不明,其理论和方法的建构几乎空白,散漫式研究是当前的现状。四库学研究缺乏一定的学术个性、话语体系和史脉观念,学术个性不如敦煌学、甲骨学、红学等突出,话语体系缺失世界性话语权,史脉观念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四库学研究应界定四库学概念,勾勒四库学理论体系。四库学研究亟须在学科与人才方面进行远景规划,认识到四库学作为交叉学科的意义所在,培养四库学人才。四库学研究更要突破主客观瓶颈,打破现有格局,走出重复性、散漫式研究局限,加强中观研究。

关键词:四库学;术语化;学术个性;话语体系;四库学派

中图分类号:I207.22;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3)03-0245-14

四库学研究历史已逾百年,较早有价值的研究可追溯到阮元《四库全书未收书提要》一书,而这只是四库学研究的萌芽阶段。四库学研究的真正发端是在20世纪初,在长达百余年的历程中,四库学研究成果可圈可点,但纵观四库学研究史,依然有几个方面需要思考。首先,四库学为何,何为四库学,这一基本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尚处于探究阶段。四库学研究群体,对这一根本性问题呈现出集体无意识状态,偶有学者表现出探究问题的态度,但并未解决实质性问题。每位研究者都从自己的四库学理念出发,研究不同的对象,造成同是四库学研究但却不知关联性为何的奇怪现象。由此,四库学研究出现了“层裂”景观,即每一角度的研究形成单独层面,难以看到扩张、联系与关照。比如《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研究,只针对定本进行探究者甚众,论及稿本与阁本较少,而深入探究稿本、阁本、定本关联性的凸显性成果亦渺。第二,四库学研究成果零散,有学术史地位和意义者屈指可数,且多集中在民国时期和最近二十年这两个时段。对已有研究成果借鉴吸收不足,导致重复性研究大量出现;对已有研究成果认识分析不足,导致领域拓展明显受限。即使有角度、有问题,但却因时间、团队、学界认可度、内外评价机制等限制而难以展开系统性、规模性研究。四库学呈现出“碎片”化研究状况,虽只言片语或有开创之功,但对于百年研究史来说,步子迈得似乎慢了。面对庞大的研究对象,学界表现出一种试探性前进态度,换言之,针对难度较大的问题表现出机械性退缩。迄今为止,学界对四库学主要研究对象构

作者简介:张晓芝,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四库全书》研究学史”(19GZGX23),项目负责人:张晓芝。

架的领域探索不足,整体性、系统化成果长期缺席。第三,由于四库学研究层裂化、碎片化特征明显,部分研究成果归入古代文学诗文专题研究、版本学研究、目录学研究等领域,四库学研究成果湮没于不同专业,客观性地被动“减缩”。这说明四库学研究缺乏独立性、标记性、特殊性等显性特征,边缘化程度明显。同时,四库学缺少研究阵地,国内外期刊发表四库学论文者较少;而其他可称“学”者,研究阵地已成规模,如红学有《红楼梦学刊》,敦煌学有《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辞书学有《辞书学研究》,简牍学有《简牍学研究》,而甲骨学研究刊物更是多达十数种,且上述诸学研究多受到世界瞩目。四库学研究阵地初创,规模不大,这就使得四库学研究成果在“边缘化”的过程中有可能被消解,逐渐失去特色。

一、“四库学”概念含混的四十年及其层裂化产生的必然

“四库学”概念如何提出,提出者何人,很多学者已经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周积明称“‘四库学’之名,其源无以考索”^[1],何宗美说“‘四库学’的说法始于何时及何人,似难确知”^[2]。实际上,四库学要想发展,并打算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四库学”概念必须清理。而要想弄清“四库学”概念,又必须分析其提出的时代背景、学术指向、理论架构等。

(一)“四库学”术语范畴

“四库学”一词于1983年提出,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一文说:

到了民国,从事四库全书有关问题研究的风气很盛,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有的从事版本的探讨,有的订正提要的错误,有的论述四库全书纂修的经过,有的则呼吁续修或影印四库全书。这些研究,不仅超越了清代对四库全书讨论的范围,更引发了中外学者对四库全书的重视。事实上,四库全书有关的问题,还有许多等待大家研究,为了使这门研究工作,成为系统的学识,我称之为“四库学”。^[3]

昌彼得《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称:

因为四库全书收录的繁富,修纂的过程又极复杂,故近代颇有专门研究其书的。或研究四库纂修的经过,或辑录有关四库全书的档案,或研究四库禁毁的情形,或研究四库著录图书的版本,或考证四库提要的谬误,故有“四库学”之名。^[4]

合并刘、昌二人所述四库学研究的内容,包括《四库全书》纂修研究、著录版本研究、总目订误、编纂档案辑录、禁毁书研究、影印与续修等六大主题。主题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研究已深入,检视1980年代之前的四库学研究,发现上述六个方面均处于起步阶段。根据刘兆祐统计的70年来有关《四库全书》研究著作,去除重复,仅得31种,且有9种为稿本而并未实际刊行故多不为人所知。四库学概念提出之初就存在“实”与“虚”两个层面,所谓“实”,指的是已有研究粗略勾勒四库学研究各领域轮廓,边界较为模糊,浅表化现象突出;“虚”则是无论哪一领域皆未形成系统的学识。也就是说,直到1980年代初,四库学研究领域尚未定型,研究体系尚未建构。那么,四库学概念的提出其实就只是一个愿景。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世界书局出版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一书,其中“四库全书通论”部分涉及今天四库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从知识体系的总结到主要命题的提出,从《四库全书》各类书目到续修《四库全书》,对四库学的宏观概貌已有初步描绘。特别是杨氏所指《四库全书》史上的几个主要命题,如四库全书馆的搜集工作、四库全书馆的组织、四库全书馆中的学者、收藏四库全书的七个建筑物、四库全书的印刷问题^{[5]29-44},一定程度上分析了《四库全书》研究应着重解决的问题,但直到1980年代初,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尚付阙如。

(二)“四库学”学术指向

四库学术语的提出,是为了继续推进研究工作,“称‘学’与否,最终并非由研究领域和研究对

象来决定,而是以对此领域和对象研究推进的程度、取得的创获、建立的体系等方面来考量”^[2]。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四库学一词的学术指向进行分析。

其一,四库学研究指向并不明确。从《四库全书》这一对象出发,凡与其有关的研究皆称之为“四库学”,这从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一文可轻易窥知。四库学成为近似于无边界的概念,这是因为《四库全书》涵盖清中期以前各种文献,其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架构知识体系,使原本分立的个体形成相互关联的整体,并以“提要”为总纲,使独立著述之间发生联系。《四库全书》涵盖的范围过宽、过广,导致研究成果分类出现交叉甚至混乱。如研究某一书籍的版本源流,这与四库学并无关联。但如果从四库馆臣选用底本作为研究角度,那将被列入四库学研究领域。事实上该文献的版本源流依然是研究的重点,四库底本是切入研究的一个角度。又如“《永乐大典》纂修研究”,这一论题与《四库全书》毫无关系,而“《永乐大典》考”则涉及到清乾隆间辑录《大典》佚书,编入《四库全书》事宜,这才与四库学产生关联。

其二,四库学研究指向并没有建立在高度的学术认同基础上。学者缺乏对四库学术语确切内涵的思考,研究者自身甚至都不能有条理、有系统、有理论地呈现四库学概念。从文献角度出发者,四库学包括四库纂修史科学、四库版本学、四库目录学、四库校勘学等;从纂修角度来看,四库学涉及四库馆运转研究、人员择选与配备研究、书籍进呈研究、书籍禁毁研究等;从纂修思想层面来看,四库学又涵盖纂修官提要稿个体思想研究、稿本阁本及定本系统《总目》思想研究等。而由于各层面之间的立足点不同,研究成果往往出现相互撕扯、互不支撑的情况。特别是文献研究与思想研究的差异,二者的结论时常相悖。四库学应该从研究视角进行检视,建立基本的学术认同体系。

其三,四库学没有术语化的过程。自刘、昌二人提出四库学一词,较少见到关于四库学术语的讨论。进入21世纪,学者偶有对四库学一词进行思考,然四库学究竟是什么,现在看来也没有一个完整、合乎逻辑的答案。简言之,学者缺乏对四库学内涵的基本思考。四库学的内涵越来越模糊,外延似乎越来越宽阔。这是一对矛盾,在内涵不清楚的情况下,外延的宽阔是一种自欺欺人。范围随意扩大化,或将使四库学走向偏颇。

其四,四库学国际化话语缺失。四库学的本国学术与世界学术几乎无衔接,除日本、美国少数研究清史的学者偶有涉猎之外,尚无专门研究者。而在国际研究领域,甲骨学、敦煌学等有较多海外研究者参与。甲骨文发现120余年来,海外研究者遍布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数十个国家。敦煌学更是国际“显学”,研究初期仅日本就集中了石滨纯太郎、羽田亨、神田喜一郎、小野胜年等一批学者^[6]。四库学研究对象并未像甲骨文、敦煌文献那样横空出现,而是随着历史发展被时代推着前进的一个研究领域。

(三)“四库学”成果分析

基于以上所述,四库学学术指向的薄弱性毋庸置疑。但百年四库学研究成果似乎不应忽视。通过对《四库》研究成果的分析,一方面或许可对四库学术语进行补充完善,建立系统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可量化分析四库学之研究现状,以为四库学研究走向提供数据支持。研究成果的统计参以综述类论著及各电子数据库,运用统计学原理,呈现数字化特征。参与统计的主要文献包括以下几种:1.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2.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3.孙彦等编《四库全书研究》;4.海南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四库全书研究》(《海南大学学报》增刊)和《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库全书研究》;5.甘肃省图书馆与天津图书馆合编《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1908—2010)》;6.甘肃省图书馆编《四库全书研究文集》(三册,收文截止于2015年);7.《(首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会议论文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6年);8.《第二届中国

四库学高层论坛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2017年);9.《第三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论文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8年);10.《四库学论坛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2018年);11.《中国四库学研究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2019年);12.《四库学论坛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2019年);13.《第四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论文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9年);14.《四库学》集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以来,共9辑);15.《中国四库学》集刊(中华书局,2018年以来,共7辑)。上述文献收录的四库学研究成果有重合之处,自当剔除,部分文献又可相互补充。另外,2010年以来,学界持续关注四库学,程惠新、陈东辉、邓洪波、张洪志、李勇政等撰有四库学研究综述。据上述文献、综述文及各类数据库,将所有成果进行合并筛选并分类统计,得出如下结果。

截至2022年底,四库学研究成果共7700余篇,约分10大类,包括综论、七阁研究、《总目》研究、《总目》外书目研究、影印及续修研究、阁本与底本研究、抽毁与禁毁研究、未收与失收研究、史料与馆臣研究、工具书编纂等。其中综论性的论著占主导地位,达2600余篇;其次为《总目》研究,有2000余篇。二者占研究总量的近60%。其他8类研究成果分布亦不均衡,史料及馆臣研究730余篇;七阁研究最少而不足100篇,这8类研究成果占比均在10%以下,几乎成为四库学研究中的“冷门”。另有“不归类”研究600余篇,与四库学研究有关,但却无法归入十大主题中的任何一类,如果将“不归类”研究成果进行主题划分,那将出现几十种类型,每种类型成果数量均为个位数,成果无法类型化,自然不具备总结、分析、探索四库学发展规律的学术意义。这也恰恰说明,四库学概念内涵与外延不清,可能会造成研究边界的无限扩大。

换个角度分析,以1983年“四库学”概念的提出为界,研究成果可分为前后两期。现以《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1908—2010)》及近十年四库学研究成果为例略作说明。前期为1908—1982年,70多年间文献总量为1200余篇,且很多是新闻稿或杂记,特别是1920—1940年代关于影印和续修《四库全书》的讨论,杂记甚多。这一阶段四库学研究成果以余嘉锡、胡玉缙等人的《总目》考辨及补正之作为代表。而实际上总目学只是四库学的一个分支,四库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有的甚至并未纳入研究视野。后期为1983年至今,论著总数达6500余篇,是四库学概念提出之前的5倍多。按理说这应该是四库学飞跃发展的时期,但数字上的判断却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不是因为四库学概念提出之后的研究才有了迅速发展,而是学术环境的变化带来的研究者数量陡增,反映在四库学领域则是论著数量增多,但并非有大量学者在四库学领域集结,更多的学者仅仅只是偶尔“客串”而已,随即迅速退出这一领域,这部分研究者数量很大且多有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从发文者所属领域来看,一般以历史学、文献学、文学、图书馆学等为研究方向,四库学甚至称不上是这些研究领域的附属。另一方面,据笔者统计,其中有重要价值和学术意义者不到两成。新史料的发掘很少出现,新观念的提出也较为少见,“炒冷饭”的现象依旧存在,正如杨洪升所说,“百年‘四库学’研究尽管有5000篇文章与几十部专著,但是高水平撰著仍偏少”^[7]。因此,研究文献数字上的增加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四库学的发展,却不能从本质上揭示四库学的研究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对《四库全书》进行综论及对《总目》进行研究的文章很多,占有四库学研究成果的六成有余,但因综论涉及面过宽,难以在有限的文字内将观点阐述清楚,多数此类成果实际上价值不高。从成果比例来看,层裂现象很明显,而且占比在10%以下的研究成果几乎成为四库学研究中的“冷门”。2000年以后,虽然四库学研究深度和广度均有所增加,特别是《总目》思想观念方面的研究开始呈现快速发展,但从总体考量,四库学学术指向仍然没有明晰的线索。

(四)“四库学”的层裂化

程喜霖在思考敦煌学百年研究时指出“敦煌学术史有所研究,而敦煌学理论与方法几近空

白”^[8],百年四库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建构上与此相似,也几乎是空白。30多年前罗宗强和卢盛江先生在反思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时说:“我们也似乎并未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以作为分析古文论的理论参照,大多是东采西摘,零担贩运。”^[9]综观四库学研究成果,重复性研究和无深度研究占比很高。就理论体系而言,“四库经学史”“四库史学史”“四库子学史”“四库文学史”还只处于讨论阶段。一些理论词语也只是基于《总目》的研究所得,关于《四库全书》从修纂到完成再到传承与研究,这一过程的编纂史、史料学、文献学理论几乎未见,更谈不上建构了。“四库文献学”本应成为最早建构起来的学科,但因文献学具有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四库文献学”难以成为单独的学科,现也处于尴尬位置。因此,四库学理论术语的提出首先需要对四库学研究范围进行界定,这又回到了话题的本根。

无研究者对四库学概念进行系统界定,在无边界无范围的情况下进行散漫式研究是四库学研究的现状。各研究角度复杂无序,研究内容部分重复,研究成果体系性差且互不支撑,是四库学研究的主要弊端。自四库学术语提出至今,这种现象已持续近40年之久。基于四库学概念含混,尚无学术体系的情况,本文在这里试图界定四库学概念,并勾勒四库学理论体系。

四库学概念的探究需要注重宏观勾勒与细节研究两个层面,前者为纵,后者为横,纵横交错,以揭示四库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宏观层面的四库学研究是指围绕《四库全书》纂修过程及历史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的学术探究。囊括范围较大,视野较宽,在某一领域形成知识和理论的系统性结构,要求研究者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四库学的规律和特质,从“大历史”角度进行规模性探究,包括《四库全书》纂修史、《总目》编纂史、禁书史、续修史等。主要研究成果应以四库文献出版史、四库文献研究史、四库理论研究史、四库档案史、四库思想史、总目研究史等为中心。宏观研究要有非常大的广度,除此之外,“关键还在于研究者应具备宏阔的学术眼光和理论深度”^[10]。细节研究是指与《四库全书》实质相关的个案研究,包括七阁分阁研究,《总目》稿本、阁本、定本某一系统研究,《荟要》研究,《四库全书》底本研究等。如文澜阁《四库全书》补修、《总目》稿本的发现、《荟要》提要研究等,均为四库学细节研究课题。研究成果是否属于四库学细节研究,应该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研究成果是否是四库学研究体系的重要补充。

四库学概念的厘清及理论架构的形成是避免“四库”研究走向层裂化的关键点之一。四库学研究成果与“四库”相关研究并不是一个概念,并非所有带有“四库”字眼的研究皆可视作四库学成果,如直接探讨某一书籍版本,而兼涉“四库本”讨论的研究其实应该属于文献学中的版本研究。如果试图用“大四库学”“广四库学”“超四库学”来涵盖所有四库学成果,实际上是极不科学的,均属于伪四库学。试问,《四库全书》涉及万余种(包括存目)典籍,研究其中一部是不是也属于四库学研究,这明显是荒谬的。当然,“大四库学”等概念并非不能用,只是使用之时需要进行界定,并进行严谨的论证。我们通过对四库学术语的探讨,主要是为了思考四库学应该拥有的学术体系,因为没有体系的“学”在理论上是不能称之为“学”的。今天的学者虽然仍在不断使用四库学这一术语,但却一直忽略了“学”的体系性建构。

二、“四库学”研究学术个性、话语体系与史脉观念的缺失

(一)“四库学”学术个性的“弱呈现”

总体而言,四库学研究是文献学、档案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的附属品,缺乏区别于上述学科的学术个性。这里的学术个性包括专业本身与研究者的两个层面。首先,四库学专业的学术个性应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长期研究中并未发现其个性的“显性”存在。甲骨学以其独特的载体、特殊的符号彰显个性;敦煌学因其发现的地理位置、文献的稀有性突出学术个性所在;红学以其

作者扑朔迷离的身份、书籍传承中的复杂版本系统突显专业个性。那么,四库学专业个性为何?或者说四库学应有的阐述方式是什么?在长达百年的研究中,学者并未深究这个问题。随着时代推移,四库学呈现机械性、偶然性、被动性、无意性的发展。这是四库学发展受限的重要方面。事实上,从《四库全书》编纂的完整过程来看,四库学应该不比甲骨学、敦煌学、红学任何一门“显学”逊色。但为何四库学的学术个性就无法呈现呢?主因盖有三端。

其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清代并未有人倾力关注,大多把其作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工程”看待。《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11]1849},因其“钦定”身份,清代没有学者敢于研究。也就是说,在清代,四库学没有产生研究土壤。如此一来,时间愈久则文献湮没愈多,知其来源者愈少。进入民国时期,知《四库全书》掌故者渺矣。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序》中称:“四库全书之名,读书稍多者类能知之。至其开馆之经过,与夫纂集之旨趣,则非钻研国学,习于掌故者,鲜注意及之也。”^[12]从任氏所言可知,民国时《四库全书》名称在学人中尚未普及,而其来源更是知之者甚少。但较少研究者关注并不是造成四库学专业缺乏学术个性的重要原因,主要是百年沉寂造成了文献流失,特别是四库馆臣关于纂修工作的私家记载,几乎湮没无闻。迄今为止,仅有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称得上是对《四库全书》纂修事宜有系统发覆且文献发掘较多的一部佳作^[13]。是书所考四库馆开闭馆时间、机构职能、办书流程皆特费时日精力,但所用私家记载材料较少,文献多赖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库学私家文献流失严重。事实上,官方文献亦有佚失,如档案中记载的“四库底本档册”,和珅清查四库书底本致函质郡王永瑤时明确说明“四十五年查办时曾照纪大人处所存书目抄录一本,钐盖翰林院印信”^{[11]2047-2048},因而此档册至少有纪氏、和氏两本,时至今日未发现其中任何一本,底本档册或已不存。《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辗转飘零两百年,沉寂澳门何东馆中也有半个世纪之久,2000年方才影印出版^[14]。《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也是现今存世绝少的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产生的文献资料,现藏于台湾地区,2012年12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原尺寸影印出版,但其据以誊录的底册,也就是各家提要稿初次汇编的草本,或永难得见。四库学若想以“学”著称,或欲成为一门“显学”,其文献系统应率先厘清,佚失的、存世的,官方的、私家的,鸿篇巨制的、吉光片羽的,皆需整理统计。《四库》诸阁史料、《总目》《简明目录》版本系统、《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考证》等资料均需按类编排。四库学需要重建史料体系,补充完善《四库全书学典》建构的资料体系,特别是《四库全书》通论、辞典、综览三大学术体系^[5],并建立研究成果数据库。如此,四库学的专业学术个性或许才会有所呈现。

其二,四库学研究畛域较广,学术系统的边缘未明。《四库全书》生成环境颇为复杂,不深入了解清代康、雍、乾三朝文化政策、社会背景、政治氛围,很难清楚界定《四库全书》的修纂在中国历史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政治、文化、学术、思想体系的规模过于庞大,研究者常常无力勾勒《四库全书》“家族”体系的轮廓。但无论学术背景如何复杂,这一工作是必须做的。有部分学者进行考索,四库学研究领域或可据此划定。1920年代,陈垣检阅文津阁《四库全书》,撰有《四库书目考异》四卷^[15]。随后,金梁借录陈氏《考异》,整比增补为《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此书未付梓,民国时期学者亦未见^[16]。但陈、金二人所研究的《四库全书》诸问题,无疑是四库学的领域之一。1937年,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出版,全书自“《四库全书》纂修缘起”开始,至“《四库全书》评议”结束,共12章主体内容,几乎涵盖了四库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四库全书》修书缘起研究、四库全书馆研究、《四库全书》编纂史研究、《四库全书》校勘研究、《四库全书》禁书研究、七阁研究、《总目》研究、《荟要》研究、《续修四库全书》研究九大主题,其所勾勒的四库学体系理应得到学界重视。此书自1930年代出版,至今仍在重印。而吴哲夫《四库全书荟要纂修考》(1976

年)、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2005年)、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研究》(2018年)等,皆不出郭氏所建构的《四库全书》体系。既然已有学者建构起立体的学术体系,四库学实际上的塔基、塔身已然成立,其学术系统的边缘或许应该围绕这一“学术塔”进行划定。期待四库学外延的清晰化、四库学学术系统的合理化。

其三,四库学学术个性缺失,又在于优秀的四库研究者较少。就学者的学术个性而言,它首先应该具备最基础最全面的古代经、史、子、集知识体系,并数十年钻研于四库学之塔顶,现在的研究者或无人有此贯通能力。单单就精通经学的某一专科来说已属费力,遑论其他部类。《四库全书》研究特别是《总目》研究更是需要基本的贯通,方能进行有效研究。余嘉锡、胡玉缙毕生精力所聚,成《四库提要辨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两书,其至今日依然发挥引领学界之功。詹福瑞说:“学术个性是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从学术观念、学术思维、研究方法以及成果结论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特性。”^[17]那么,四库学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就应该具备探究四库学本质属性的观念和思维,拥有足以能够推动学术创新的能力。现在四库学界的学术创新力较为薄弱,大部分论著无法引起学者对四库学的较大关注。四库学的学术自觉依赖于成熟的研究者,但是优秀研究者的出现无法遵循某种方式刻意培养。四库学研究应该鼓励学者沉淀已有成果,并能尊重差异,给予学术发展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研究方法和结论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拥有学术个性的学者对研究方法也极为重视,探索力很强。刁生虎曾研究钱锺书的学术个性,谈及钱氏的一种研究方法,将“乾嘉学术由字而句、由句而篇、由篇而书”单向认知模式进行了改进,用朴学之法往复数次研究某一问题,其称之为“阐释之循环”^[18]。四库学研究已逾百年,研究方法多承袭传统,改进或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不仅会带动学术进阶,亦可能成就学者的学术个性。另外,因为四库学体量庞大,所以进入四库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可能在气质性情、知识结构、科研经历、学术旨趣等方面皆不尽相同,学术个性的展现或从此发端。

(二)“四库学”话语体系的“伪独立”

四库学百年研究史并未形成学术派别,“四库文献学派”“四库理论学派”“四库批评学派”并未见诸学界。换言之,四库学话语体系尚未成型。话语体系为何?从学理上讲,话语体系是运用语言符号表达理论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的表达”^[19]。从方法论上说,话语体系为“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20]。之所以探讨四库学话语体系,是因为话语体系是基础,由话语体系形成学术体系,再由学术体系形成学科体系,四库学由此而立。但是,四库学的话语体系缺失了什么?四库学未来能否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呢?

大凡一门学问都有核心研究点,进而形成话语核心、理论核心。四库学的核心话语包含两个方面,一为文献,一为思想。四库学文献话语体系应该最早建立起来,但尚无“四库文献学史”这样的著述将其予以架构,导引学界。四库学文献话语体系包括的范围也广,例如,《四库全书》抄录的古籍,这3000多种古籍在《四库全书》中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未曾一一落实,仅靠“四库本不宜用”笼统概括,恐难令人信服。又如,《总目》中的失误,从余嘉锡、胡玉缙有辨证之作开始,又有李裕民、崔富章、杨武泉、杜泽逊、江庆柏等后继者,然《总目》文献清理短时间内似乎难以完成。再如,纂修《四库全书》私家文献的搜辑尚未起步,现所能征引的私家文献局限于纪昀、于敏中、陆锡熊等著述,但其他馆臣所记的只言片语亦弥足珍贵,却一再被忽视。因此,以四库馆臣为中心的清人别集似未纳入研究者视野。从这几点来看,四库学文献话语体系的建立尚需时日。而四库学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就更加薄弱了。就目前来看,四库学思想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总目》之中,但《总目》经学思想、史学思想、子学思想、文学思想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部分研究都不

甚理想。近几年,《总目》思想研究处于发力阶段,文学思想研究(集部研究)走在前列,而其他各部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四库学研究首先应该“提升研究者之‘学’的意识”^[1],思想体系在这一意识之下才会继续向前发展。所以,无论是文献还是思想,均需清理已有的纷然杂陈的研究成果,将零碎话语形成逻辑体系。

四库学话语体系具体缺失了什么,如何弥补?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审视四库学百余年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予以说明。在思想探究方面,国内学者基本用社会政治性、历史溯源性的反映论概括,形成固定的研究模式,不缺史实,但缺史观。1980年代,美国学者盖博坚(R.Kent Guy)从学者与国家的互动层面进行研究,得出“学者都自愿,甚至热情地参与了《四库全书》纂修”“国家在学术界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被广泛接受了”^[21]等不同于国内学者的结论。国内研究者史观的一致性,源于过度关注清代修书工程的局限性,对清代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价值认同的文化体系予以固定化观察。由于思想研究的限度,目标存在预设性,视角缺乏多样性,方法呈现重复性,成果自然难于突破。在理论批评方面,基础架构单薄,宏观研究者从修书工程入手,探究清中期官方思想管控,忽视《四库全书》作为文化活动应该会有必要审查。微观研究者忽视的细节就更多了,四库馆臣个体思想差异,秉持的学术思想观念,长达数年修书工作中的心态变化,这些需要逐一查阅四库馆臣文人别集方有结果,但是除对纪昀等个别馆臣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之外,四库馆臣群体研究尚未撕开冰山一角。而中观研究方面,偶有探索修书政策与文人思想活动的关系,官方主体意识与私家学术的关联,这作为学术创新点是值得肯定的。因此,话语体系的缺失究其根本是因为四库学研究还不深入,很多基础研究尚未展开。只有明确四库学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才能形成话语体系。四库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内外并举,内在建构就是剖析四库学之旨,外在建构即为揭示四库学之象。除此之外,四库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还需要拓宽视角的广度和宽度,同时关注四库学研究成果的有效性,经、史、子、集批评体系不能流于浅表。

四库学未来话语体系的建构还应该注意两个发展层面,区域性与世界性。四库学区域性话语体系的建立在最近几年有所发展,自2016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首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引发对四库学的持续探讨”^[22]。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先后举办“四库学论坛”,但论文集均不涉及四库学概念及四库学话语体系的探讨。一般而言,四库学区域话语体系需要几代学人集中力量建构,而非一朝一夕可成。从国内各大院校所建立的“四库学研究中心”来看,四库学区域话语体系的建构未来可期。但四库学话语体系的世界性,现在看来尚不可能。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法国狄德罗编的《狄德罗学典》(1751—1772)为世界所瞩目,而同样是在18世纪,与《狄德罗学典》具有相当地位的《四库全书》,在欧美研究者中则极为陌生。即便是1946年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出版了《四库全书学典》,也未能引起国际上对《四库全书》的关注。杨家骆曾说:“四库全书与狄岱麓学典,既然是产生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则其世界观念,知识范围,和对处理其世界中知识的精神与形式,及其处理时的环境与处理者的人格等,皆为造成两书异点与其影响不同的成因……然其同为清算其知识世界之产业而谋以之产生其理想中的后果,则初无二致。”^{[5]2}也许因我国古代语言系统的障碍,世界各国学者对《四库全书》及《总目》的研究“望而却步”,但这并非主因。“敦煌学”难度恐在四库学之上,却成为国际学术热点。2019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举行^[23],足见其世界性话语体系的强大。对四库学研究而言,应该立足当下区域研究,放眼世界。随着全球文化体系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不久的将来,四库学研究也许会成为世界关切的学术点之一。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一书入选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此书将译为英文出版发行,这是四库学研究的一小步,却是

其走向世界的一大步。那么,着眼四库学未来,话语体系的主导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应该是区域性的建构,但对四库学世界性话语体系的发展趋势要有所预见。

(三)“四库学”史脉观念的“模糊态”

四库学应该是一门理论学科,从其诞生至今,史脉不断,但研究者却缺少基本的史脉观,常囿于一隅。如《四库全书》编纂动因这一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存在误解。1933年,孟森提出四库开馆在于“根本删改、禁毁原书”^[24]。1937年,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第二章以“寓禁于征之实际情形”为题,详为论证“寓禁于征”的纂修目的^{[16]15-55}。1958年,陈登原引《东华录》《高宗实录》等文献,提出“修四库为禁书说”^[25]。1980年,刘汉屏接受“寓禁于征”的修书政策^[26],并以“史话”形式面向大众普及。1985年,吕坚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寓禁于征”》为题,直指《四库全书》纂修的“本来面目”是“寓禁于征”^[27]。2009年,《辞源》修订版“《四库全书》”词条下称“纂修时乾隆从维护清王朝统治出发,以宣扬封建教化为宗旨,寓禁于征,对不利于其统治的著作,或销毁,或命馆臣恣意篡改”^[28],明显受学界传统结论的影响。直至1995年,陈新提出“寓禁于征”的论断系“偏颇臆造”^[29],《四库全书》的纂修动因才得以学界重新正视。《四库全书》编纂目的的探讨,涉及对《四库全书》的根本性评价,这一问题值得重视。但是为何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内,无学者对这一问题提出异议。这或是因为学者对待清代历史,特别是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较为熟悉,其固有史学观念在一开始就占据主导地位,加之《四库全书》纂修期间有删改、抽毁、禁毁书籍的行为,致使学者长期蒙蔽于固有观念中,因果关系出现倒置。事实上,《四库全书》纂修最初动因也许根本不存在“寓禁于征”的观念。

四库学研究过程中史脉观念缺失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四库全书》纂修史料尚未完备;二是片面性、重复性研究难以呈现史脉线条。就前者而言,四库学研究应该建立在翔实、全面、可靠的史实基础上,现在所能见到的研究多依赖官方文献,如《办理四库全书档案》(1934年陈垣辑)、《纂修四库全书档案》(1997年张书才编),官方史料的辑佚工作至今仍无补充。私家记载的史料发掘更少,《于文襄手札》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但因草书书写,识读困难,加之未有编年,利用率不高。《四库全书》纂修主体统称四库馆臣,这一群体达几千人,难道对修书活动集体失声?现在所能见到的四库馆臣别集中,有部分文字记载当时修书情形。史实缺失,造成研究偏狭,史脉自然不明。史脉观建立在“点面结合”的史料之上,既包括宏观梗概,又旁涉微观细节。就后者而言,史料的基础工作影响史观的形成,然既有材料并非无法支撑系统研究,而是研究过程存在局限,学者旨趣并不在此。1920年代,王伯祥《四库全书述略》^[30]、杜定友《四库全书述略》^[31]、藤塚素轩《四库全书编纂及其环境》^[32]等论文对《四库全书》修书之事已展开研究,可惜皆未深入。1930年代,借选印《四库全书》之机,李时、江都、叶仲经、黄云眉、谭其骧、姚石子、陈登原、近腾纯雄、曲正等学者对《四库全书》纂修均有评议,然创见不多。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对《四库全书》史进行研究的不乏其人,但有所突破者甚少。1990年代至今,《总目》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四库全书》则多转向某一版本研究,四库学中关于史脉观的建立处于搁置状态。学者关注的新材料多与《总目》有关,总目学成为四库学的重要分支。

三、当下四库学研究的隐忧

四库学研究最大的隐忧是学理层面上的问题。除四库学研究团体之外,学界对四库学持怎样的态度,其在人文科学上的原理与法则是否被广泛接受,四库学的建立需要事先预判这一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其所属一级学科门

类涉及文学、历史、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虽然这些学科之间存在相互关联,但学科之间独立性特征也很明显。而四库学在学科分类体系中存在相互纠缠的现象,所属并不明确。这一问题有两个发展走向,一方面四库学有可能走向壮大,出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可能;另一方面则可能会出现混乱,产生各种无关甚至违背学理性问题的研究,这在四库学研究中已然出现。在一级学科之中,四库学归属本身就存在问题,二级学科又存在被消解的危险。如四库学中《总目》的诗文观念研究,其所属应该为古代文学分体研究。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四库学成果最后都有可能被某一学科分解,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如何,很难说清。但这并非只是四库学遇到的问题,敦煌学也同样遭遇了这一尴尬,一直有学者试图解决敦煌学的这一问题,并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从石滨纯太郎、陈寅恪,到姜亮夫、周一良、唐长孺,再到林家平、宁强、罗华庆、荣新江、郝春文,直到2019年刘进宝还发表文章再论敦煌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33]。相比于敦煌学,我们对四库学学理性的探讨就显得尤其薄弱。正是因为对四库学的研究对象无系统的讨论,四库学未来的研究走向可能会出现如下问题。

(一)四库学的内里逻辑问题

《四库全书》的修纂是在总结“大文化”背景下完成的,涉及文化回顾、学术重建与思想禁锢等一系列内在逻辑的判断与分析。总结中国文化、学术、思想并非易事,特别是经过历史沉淀后各朝代不同的观点已然流传,经典的“知识”如何评价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四库馆臣在复杂的知识体系中游离、剥离、沉浸,又受官方学术思想的调控,他们自然无法解开历史遗留的困惑。馆臣的学术思想有时代局限性,如何客观评价这—问题是四库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形式逻辑方面,研究者可能只关注到常识性错误,却没有深究错误背后的各种细节。论证逻辑方面,四库学者通过《总目》不断探索自身的困惑,却很少站在馆臣的角度去追问一个事实,即馆臣反思经典知识、建构官方与个体相互妥协的综合性学术思想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综合进行推理,馆臣的总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成功的,因为《总目》已成为学术经典;那么,四库学研究者的反思如果成功,也会成为新的学术经典,但是百年四库学研究成果堪称经典者屈指可数。四库学研究可能存在各式各样的观点,这是思维差异造成的。但无论思维如何变换,四库学研究的逻辑层次和深层分析理路不可或缺,这是检验四库学成果的关键指标。还有一个潜在的逻辑层面,《四库全书》是规模性的文化总结活动,其作为大型数据库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四库全书》背后的历史文化对四库馆臣和当代学者的吸引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时代背景的产物与超越时代的研究必然会产生隔阂,四库学本身的文化吸引力或许并不如甲骨学、敦煌学、红学强大。

(二)四库学的学科与人才问题

学科方面,四库学与历史学、文献学等有着密切关联,而《四库全书》又包罗万象,容纳了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历史、文化、金石、佛道、医药、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文献,《总目》对这些文献撰有提要,诸提要之间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批评。由此看来,四库学研究对象多元,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四库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努力使其成为某一专门的学科,这样不仅不会得到认可,反倒会走入困境。四库学应该根据交叉学科的特点,搭建学术平台,成立研究团队,建立学术资源库和数据库,培养专门的四库学人才。以历史学、古代文学、文献学等领域作为切入点,进驻传统学科内部,形成体系和特点,最后能够剥离出来,成立有特色的四库学研究领域,这是一种途径。四库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最好的方法是在完备的体系之下对四库学进行再分。人才方面,现在的问题是,除少数学者在四库学领域浸淫时间较久,其他学者很少在这一研究领域持续开拓。随着学科的细化,四库学面临的问题越发严重。后续力量接替不上,将

会使四库学面临消解的境遇。自2016年始,“四库学高层论坛”已举办7次,与会者最多达百余人,从规模上看似乎没有问题。四库学研究也从集体无意识、无态度,扩大到有相当规模的研究群体,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分析与会者的研究领域发现,长期从事四库学的研究者不足1/3,其他学者皆非长期从事四库学研究。另者,参加四库学论坛的主要是青年教师,硕博研究生占比很大。虽有后生力量,但不能过分乐观,四库学要想壮大,尚需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检验这部分力量的耐力、韧力、能力与定力。定力不足是四库学发展的短板之一,在当下,有人愿意从事“冷板凳”的工作越来越少了。但无论如何,四库学研究需要进行人才培养,硕博研究生是一个主体,然后争取能够学历下移,从本科开始进行四库学文献入门。我们不希望当四库学成为冷门“绝学”后,才意识到四库学的价值所在。

(三)四库学研究存在的主客观瓶颈

主观瓶颈包括学科范式的建立,自我身份的认同,理论体系的建构,这在前面有所论述。四库学研究应该着眼未来,宏观体系率先建立,各四库学研究中心协同合作。一要清晰地分析四库学研究的流脉,准确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研究成果之间的互动关系。各类型的研究成果互为参照,各自的优劣性自然就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二要重塑四库学传统研究理路,以严谨的学术史眼光对四库学研究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关照,形成理论自觉。哪个时段有真正价值和经典意义的学术作品,需要如何借鉴、分析和继承也是当务之急。近几年,四库学中的学术泡沫颇有萌生之势。过滤四库学学术泡沫,沉淀经典研究成果,批判式接受研究成果对后续研究亦有助益。三要从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发现各自的优势和问题,一些海外汉学家的研究观点和角度很新颖,在一定程度上为四库学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得主流研究与非主流研究共存。这样,无论是学科还是自我身份、理论体系都会逐渐建立。

客观瓶颈是话语平台的搭建,在四库学领域只有2017年创刊的《四库学》和2018年创刊的《中国四库学》两种集刊,前者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主办,后者系湖南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主办。较之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等拥有的平台来说,四库学平台搭建较晚,起步阶段的稿源质量也存在问题。除话语平台之外,还需要文献数据库、数字图书馆等更大的学术平台。这一点敦煌学做得很好,如敦煌研究院敦煌学研究文献数据库、敦煌学数字图书馆等,皆可借鉴。

(四)四库学现有格局与理念的局限

纵观百年研究成果,四库学研究格局需要打开,现有研究理念也需突破。四库学要达到一门“学”的地位,首先需要研究者明白研究之“然”,更要知道“所以然”。“然”是现在四库学研究的基本状态,而“所以然”的缺位则使四库学处于相对落后的研究轨道。《四库全书》纂修中盘根错节的史实,对待每一部文献的复杂态度,都是四库学要讨论的问题,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四库学研究可以有成见,但“四库学史”不能有成见。四库学局限性的格局和理念是限制其发展的软肋,四库学首先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历史,既要有“范式”也要突破“范式”。“范式”也称“学科基质”,是“某一类科学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和准则”^[34]。范式也是从“四库学”到“四库学派”发展的基础,而现实却是四库学研究范式特征不明显,缺少原创性、开放性、实践性。四库学整体结构版图的划定需要在一定范式之下形成强大的格局,更要有服务经学史、学术史、子学史、文学史的学术理念。各民族两千多年文化的总结,由《四库全书》完成,这种文化建构的格局是很大的,研究者当以此为理念的出发点。当然,在对四库学研究进行大格局规划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清王朝的时代局限,先天性的思想缺陷。总之,在四库学研究尚未有突破之时,

研究成果体例的完备与否、知识的可靠与否,线索的清晰与否,依然是考察四库学研究的关键。四库学研究应该有专题、专论,更要有领域和规模。

(五)四库学中观研究成果的不充分

中观研究是要勾勒四库学某一问题清晰的面影,探索现象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已有的研究中,宏观概述不乏其论,微观细节探究亦随时出现,但中观研究相对较少。四库学研究的几个领域中《总目》研究相对较多,《四库全书》著录书籍版本研究相对较弱,特别是四库本史部著述,著录标准问题、版本问题、改易问题、删毁问题、音译问题等,尚未全面研究。四库学中观研究应该遵循科学实证与历史还原的思路,对典型现象进行分析,主张有史略、史观、史实、史脉的研究思想。中观研究最容易走入“一元”垄断的境地,不利于研究的进展。中观研究要容纳更多的差异和分歧,随后进行论辩,真理方能愈明。试举一例,《四库全书》编纂对明代文献的整体态度是报复性清算,但对待经、史、子、集四部的态度轻重不同,馆臣用力最深、审查最严苛的是史部,那么经、子、集三部馆臣又是如何处理的?推而广之,明代之前的各个朝代的史部文献,馆臣态度又如何?再进一步,虽然修书政策有统一的要求,但不同典籍的特点不一,馆臣看待问题的角度存在差别,史部著录的典籍是否存在违背官方理念的著述?检《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其对史部著述的查验甚严,一部《辽史拾遗》,翁氏几乎将此书目录及厉鹗按语全部抄录^[35],其他类此者亦众。关键问题是,翁氏提议著录者《四库》并不收录,而建议存目者《四库》却予以收录,这一问题在上述史部研究中处于何种地位,值得深入探讨。可喜的是,中观研究成果中,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研究》等是几部难得的佳作。

(六)四库学静态与动态研究的不对称

这里的静态研究指的是根据四库学中已存在的不对称或龃龉或矛盾的资料进行探究性研究,这种研究很容易看到问题,也能够给出部分答案。而动态研究是根据事实存在的数量为标准,判断四库学中某一现象是否符合正常规律,探究偏离正常规律的原因及可能存在的另外事实。动态研究是了解四库学某一问题的全过程,对静态研究进行补充,还能够揭示研究存在的漏洞。我们在研究《总目》从稿本系统到定本系统的过程中,常关注提要之间的差异,用差异判断四库馆臣的学术思想。如明人别集提要,“稿本系统中的明代文学观有着与定本《总目》不甚相同的观点”^[36]。但是在稿本系统中存在“一书两提要”的情形,提要主体内容无甚相关,这个问题若不动态来看,所得结论是不准确的。不能说定本《总目》提要中的内容与稿本不同,就是因为四库馆臣要重建某种思想体系进行重新创作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有8种著述存在“一书两提要”^[37],从这8种16篇提要来看,《总目》或直接选其中一篇予以扩充,或将两篇进行综合。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定本《总目》是直接选其中之一予以扩充,我们在研究从稿本到定本系统《总目》思想观念的时候,就应该舍弃另一篇与《总目》毫无关联的稿本提要。因为《总目》根本未将其中一篇稿本提要纳入参考视野,而是直接忽视,它只是《总目》编纂过程产生的一朵“无果之花”。在定本《总目》选择过程中,“无果之花”与“有果之花”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对于这种稿本系统中的提要,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分析时,要十分慎重,更需要动态分析来解决问题。四库学现象远比想象的复杂,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动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理性、感性、文本、结构、解构、表象、阐释、能指、所指、本体、客体等学术话语充斥的当下,动态研究尤其需要重视,否则四库学就会走入只有阐释学的狭长通道而无法回头。

(七)四库学治学之风的担忧

散漫式研究是当下四库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四库学本根问题不解决,研究风向就会出问题。

虽然在历史学、文献学的影响下,四库学研究成果中泛泛而谈者正在减少,我们对四库学的认识也在缓慢而从容地扩大。但是四库学研究中出现的理论命题,诸如《四库全书》中的国家认同、民族文化重建、西方文化等,这些问题看似格局很大,但很有可能是异想天开、标新立异的伪命题。四库学治学虽不限于一隅,但理论命题一定要有一个限度,如果没有,则要失去根基,泛论或广论尚可,倘若乱论、盲论则会使四库学失去实学基础,极易被边缘化。大凡一门学问,都有理论核心。四库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论述可以无限度。若研究《总目》集部提要中的文学观,这属于文学研究,罗宗强在谈论文学研究时说“多学科交叉而又回到文学本位”^[38],这是文学研究应有的态度。在进行四库学研究时,不能忘了研究的目的,蒋寅也谈到问题研究的适用度^[39],假如同是民族文化重建,以四库学为切入点,必定要有一个限度,而且从历史发展的向度来看,文化重建命题在《四库全书》纂修的过程中又有多大呢?这值得认真思考。鼓励四库学研究,也鼓励文风多样,但要在科学而严谨的治学态度下完成。四库学研究节奏可以慢,“四库学派”的群落可以少,但大空之论不应该在四库学研究中提倡。随着四库中心文献的发现(如《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等)、四库外围文献的整理(如《于敏中致陆锡熊手札笺证》《陆锡熊集》等),基础性研究越来越多,四库学成果会越来越丰厚。综合性研究是建立在基础研究之上的,只有以谨慎的治学态度方能将宏观及中观理论体系建构起来。当然,四库学研究不可能千篇一律,其研究成果至少应该涵盖研究型四库学、教科书式四库学、普及型四库学等类型。

参考文献:

- [1] 周积明.“四库学”:历史与思考[J].清史研究,2000(3):50-62.
- [2] 何宗美.四库学建构的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72-181.
- [3] 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J].汉学研究通讯(台北),1983(2):146-151.
- [4] 昌彼得.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6.
- [5] 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M].上海:世界书局,1946.
- [6] 秦梓林.“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J].敦煌研究,2014(6):129-136.
- [7] 杨洪升.“四库学”之百年史——跋《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6):79-81.
- [8] 程喜霖.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96-112.
- [9] 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J].文学遗产,1989(4):1-14.
- [10] 吴光正,李舜臣.“方法论探索”、“宏观研究”与古典文学研究的转型[J].文艺研究,2010(12):53-64.
- [11] 张书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2] 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M].上海:上海启智书局,1928:序1.
- [13]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14] 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线装本)[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
- [15] 陈垣.陈垣四库学论著[M].陈智超,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7-299.
- [16]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17] 詹福瑞.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问题[J].文学遗产,2011(6):126-127.
- [18] 刁生虎.论钱钟书的学术个性[J].学术探索,2010(3):103-109.
- [19] 郭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27-36.
- [20]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4.
- [21] 盖博坚.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M].郑云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中文版序1-2.
- [22] 张洪志,邓洪波.2016年四库学研究综述[G]//中国四库学: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2018:23-41.
- [23] 宋焰朋.“剑桥·2019·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J].敦煌研究,2019(2):39.
- [24] 孟森.选印四库全书平议[J].青鹤,1933(23):1-6.

- [25] 陈登原. 国史旧闻;第3分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461-466.
- [26] 刘汉屏.《四库全书》史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0:19.
- [27] 吕坚. 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寓禁于征”[J]. 社会科学辑刊,1985(3):113-120.
- [28] 何九盈,等. 辞源: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82.
- [29] 陈新. 是“稽古右文”还是“寓禁于征”——析《四库全书》纂辑的动因[J]. 文教资料,1995(2):79-83.
- [30] 王伯祥. 四库全书述略[J]. 小说月报(上海),1925,16(12):1-20.
- [31] 杜定友. 四库全书述略[J]. 南洋季刊,1926(1):76-90.
- [32] 藤塚素轩. 四库全书编纂及其环境[J]. 文字同盟,1928(15):1-24.
- [33] 刘进宝. 再论敦煌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J]. 敦煌研究,2019(5):13-18.
- [34] 杨豫. 法国年鉴学派范式的演变[J]. 史学理论研究,1992(2):103-115.
- [35] 翁方纲.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M]. 吴格,整理.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158-175.
- [36] 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系统明代文学观析论[J]. 北方论丛,2016(3):25-30.
- [37] 江庆柏,等.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 [38] 罗宗强. 目的、态度、方法——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J]. 天津社会科学,2002(5):97-100.
- [39] 蒋寅. 文如其人? ——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J]. 求是学刊,2001(6):82-89.

A Brief Study on Layer Cracking, Fragment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Landscapes of The Study of Si Ku in One Hundred Years

ZHANG Xiaozh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Si Ku”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seems to have ob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it has not yet become systematic.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controversies.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study of Si Ku” is ambiguous, and there is no terminological process of this concept. Unrestricted extension caused the research of “The study of Si Ku” to deviate from the existing orthodox academic system of literature and thought.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The study of Si Ku” is unclear,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theory and method is almost blank, and the research is so discursive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change. The research of “The study of Si Ku” lacked certain academic personality, discourse system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s academic personality is not as prominent as “The study of Dunhuang”, “The study of Oracle Inscriptions”, or “The study of Hongloumeng”. Its discourse system lacks the world status and it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as not received due attention. The research of “The study of Si Ku” should define its concept and outline its theoretical system. It is urgent to make a long-term plan in terms of subjects and talents for this research to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Si Ku” as a cross-discipline and to cultivate the talents in this field. More importantly, the research should break throug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bottlenecks, right the existing pattern, surmount the limitation of ideas,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medium fields.

Key words: The study of Si Ku; terminologization; academic personality; discourse system; the school of Si Ku studies

责任编辑 韩云波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